



权延赤文集



红墙内外

保健医生、卫士、陪舞演员等
回忆毛泽东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权延赤文集

红墙内外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冀步良 李明辉

权延赤文集（红墙内外·下）

作 者 权延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100 千
印 张 86
版 次 2006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4-04044-9/I · 729

定 价 298.00 元（全十一卷）

目 录

血肉性格	(1)
盼望挑战	(46)
英雄气，儿女情	(107)
我与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137)
专列进行曲	(187)
高处不胜寒	(233)
陪领袖跳舞	(273)
红墙内外的生活	(298)

专列进行曲

前驱车驶出不久，主车开动了。这是毛泽东的专列。窗外高山丘陵草木丰茂，落日下尤显壮美。这片土地在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历来以出英雄著称。天下流行一句俗话：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据说这句俗话，脱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另一句俗话。那时这片土地称为楚国。古有俗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湖南出产之尖辣极其辛辣。毛泽东说过，他几乎从学走路开始即吃这种东西。爱上这种食品，天下便再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他了。辣椒是他活跃而坚强的性格的象征。

这列由德国进口的专车挂有两节高级软包。软包内有客厅和卧室。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中，白衬衣不曾卷袖，两腿随便朝前伸出，露出打了补丁的长筒线袜。他正侧头望着女儿李敏，我捧着一把削好的铅笔进门时，正听到李敏讲：“对了，扫墓时我还看到好多算卦的呢。”

“那你也去算算么，看他算得准不准？”毛泽东微笑着说，把目光转向卫士长，“我父亲不迷信，我母亲迷信。可是不迷信的父亲跟我不是很亲，我还是跟迷信的母亲亲。母亲心善。她烧香，还让我买过香呢。”

卫士长和卫士们微笑着听，微笑着点头，不便对此发表评论。

毛泽东的目光又转向车窗外，望着朦胧的天空，流露出怀念和惆怅：“我的母亲就是因为扁桃腺炎……那时科学不发达，又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她只是扁桃腺炎，就死了。”

客厅里久久一阵沉默，只有车轮敲击钢轨发出的单调音响。毛泽东从鼻孔里长长呼出气来，眼睛一眨，目光离开窗外的天空，发现了我。放在沙发扶手上的胳膊动了动，手刚抬起一点便又放下，似乎很沉重。“哦，小姚，有事吗？”

“没事。铅笔削好了。”我将一捧铅笔放到桌上的笔筒里。毛泽东夜间办公，多用铅笔写字。依照规律，一夜能用秃二十支左右。削铅笔的工作是我主动承担的。

毛泽东朝我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说：“刚进来。”

“噢，那么你没听到。”毛泽东指指李敏，“我女儿回去扫墓，刚才指着我说，还有人骂我呢。”

李敏代父亲去给杨开慧烈士扫墓，我是知道的。可是，谁会骂毛泽东主席？我有些吃惊，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脱口而出：“肯定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笑了，轻轻摇头：“不对，不能说这么绝对。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稍停片刻，他带了思索的表情，慢条斯理继续说下去，“蒋介石挖过我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不让我干事。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他们挖了我祖坟，迷信，我不还是很好吗？我还是毛泽东么。现在人民又给我父母修了坟，也很好。我也是个人，毛泽东也是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什么高瞻远瞩，不是那么回事。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这段话讲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我耳边回响了近三十年。现在仍然响得那么真切清晰！

姚淑贤讲到这里，有些激动。胸脯微微起伏着，两眼亮晶晶。我真不想打断她讲话。

可是，追求有始有终有系统的习惯使我还是作出手势：停，暂停一下。老姚，你还是从头讲起吧？对不起，我习惯了。

于是，她停下来。下意识地抓起茶杯呷口茶水，长出一口气，似乎平定一下情绪，然后换了平静柔和的声音重新开始讲。

我是天津人，父亲是名铁路职工。1952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便没有继续升学，参加了工作。在卫生学校培训一段，分配在天津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

1953年初，领导同我谈话。说专运处女同志少，专列上应有医务人员，多为首长卫生安全方面做些工作。这样，我便调到了铁道部专运处。当时不满十八岁。

专运处主要负责专列运输任务。处长由铁道部委派。处里含列车、调度、餐车、检车、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我在医务组工作，有七八个人。

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又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或中央五大书记。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

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苏联红旗歌舞团来华访问或人大代表集体参观官厅水库都是乘坐一般专列。单包又是一种。单包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都是坐单包。比如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也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省委副书记，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了。

1953年11月，处长召集所有乘务人员开会。有四五十人。处长说：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既重要又光荣。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用党性保证。处长朝我膘了一眼。也许是随意一瞥。但我心跳加快了，仿佛有一种预感。不久前我刚刚被批准参加共产党，这次一定要考验我了。处长还在继续讲，宣布了各项纪律。他说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必须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要注意保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也不准往家写信。

那时，就连五大书记也没有固定专列。我们工作人员也不是固定在一个专列上，都是临时指派。当时开会多，或是庐山，或是北戴河，专列任务很重，都是首长一下车便马上返回来再接人。我曾参加过接送少奇、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等同志。这次与以往不一般，会是谁呢？我马上想到一个名字，但是又不信，更不敢说。

果然，我这名新党员被指派参加这次服务了。而且分配在一节软包车厢上。列车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就住在列车上，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等待二十多天。其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

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是三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在前门火车站。我们各自坐在自己房间里（即乘务室），不许随便朝外张望。工夫不大，似乎开来一串汽车，有不少人登车。前后不足一分钟，专列便驶动了。

软包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一个客厅，厅内拥有桌椅沙发。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各省时常在这里同省委领导谈话。一个主房间是首长卧室，内设浴池厕所。一个副房间是卫士长住。还有两个小房间，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列车员住。有个公用厕所，是首长之外其他人共用。1958年以前使用的老式国产车还有个小小会议室，1958年以后换成德国进口车，这个小小会议室没了，客厅比旧车增大许多。按照纪律，客厅和首长休息的主房间我是不能随便

进的，就是卫士长住的副房间及卫士住的小房间也是不叫不能去。这是既紧张又寂寞的旅程。

首先来找我的是位中等个儿留着背头的挺英俊的年轻人。他姓李，要开水。不久，又有两位很漂亮英武的小伙子来要扑克牌什么的。大概他们也感到旅途寂寞，要东西时便借机和我多聊几句，态度都很热情友好，甚至表现出一种亲近。毕竟我那时刚满十八岁，适逢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便自然而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我欣然同意。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并且谈笑风生。我们很快熟悉了。这几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孙勇、张仙鹏、李家骥和马武义。

很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可是，入夜后，李银桥（就是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仙鹏：“房间多少度？”张仙鹏说：“二十度。”李银桥又问：“主席吃饭了没有？”张仙鹏摇摇头：“他还在写。”说着，将一把铅笔放桌上，开始削。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主席？主席是谁？肯定是……我猜到了。不敢说也不敢问。

我一夜没有睡。因为感觉告诉我，主房间里的客人也

一夜没有睡。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点喊起来，我早就想见见了，做梦都想！就冲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卫士长。

李银桥进了主房间，大概是向主席汇报。很快又出来，微笑招手：“进来吧。”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道门啊！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差点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我忍住了，胸膛起伏着，站到毛泽东面前。我想向他老人家问好，可是喉咙壅塞，说不出话。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我竟愣愣的没有反应。李银桥碰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抢上一步，用两只手握住毛泽东的手，顺势扶他老人家站稳，女儿搀扶父亲一样。毛泽东的手很大很厚，我的手显得太小了，用两只手才勉强握拢他一只手。我听到毛泽东问了句什么，没听清。有些急，眼前也变得模糊。忙挤挤眼，求救一样去望望李银桥。李银桥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姚淑贤。”我的声音细微颤抖。可我本是想大声回答的。

毛泽东又问一句什么，李银桥马上翻译：“主席问你哪里人？多大年纪？”

“天津人，今年十八岁了。”

毛泽东讲话，湖南口音太重。李银桥不得不一直给我当翻译。最初那极度的紧张，激动一过，我能认真辨听主席说话，居然听懂一两句。于是，毛泽东笑了，轻轻拍拍我手背：“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了就好了。”

从主房间退出来，脸上有些蒸腾。伸手摸去，湿漉漉一片，不知是汗还是泪？这时，车到济南。专列驶入飞机场。那里有专线，可以停车休息。毛泽东要休息了。

李银桥来劝我：“主席睡觉了，不会有什么事了。你也睡会儿吧。”我摇头：“不困，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他说：“可你夜里没睡，白天还不补觉？”我还是摇头：“真的，我一点也不困。”李银桥说：“专列还要走几天，总不能一直不睡吧？”我差点问：去哪儿？忽然想起这是违反纪律的，忙憋住问话，只是说：“没事儿，我年轻，能坚持。”

我坚持两天三夜没睡觉，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觉困。我相信再过三天两夜也不会困。年轻人遇到兴奋事往往是这样。可是，专列在杭州停下了。毛泽东要下车，大

概得知我没睡觉，特意找到我的房间向我告别，并关心地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专列马上又返北京。路途上，专列处处长在小会议室召开全体乘务员会议，郑重告诉大家：“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乘坐我们专列的是毛泽东主席。”

小会议室里起来一阵骚动，大家都显得激动，尽管他们谁也没见到毛泽东。我心里热乎乎的，瞟一眼处长。处长也望我一眼，会意地笑了。我感觉特别光荣，领导对我确实是信任的。我始终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见到了毛泽东。那时组织纪律性强，保密观念也很强。

1954年初，专列又去杭州接毛泽东返京。这一次我不在毛泽东的软包车厢服务，分配在其他车厢值班。我去打开水，经过餐车时，怔了怔。毛泽东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泽东看到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好吧？”说着，毛泽东已经向我走过来。

“小姚，快去，快过去呀。”李银桥暗地里捅我一下。我忙朝毛泽东走去，脚步很快。我很激动。只见过一次面，毛泽东却记住了我的名字！

毛泽东坐在餐车尾部用餐，我是从餐车前部进门的。当我走到餐车中部时，毛泽东也走到餐车中部。我不知手中的暖瓶哪儿去了，反正我是两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你又来了，你好吗？”

我说：“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来，一起吃饭吧。”

“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

我仍然拘束紧张。直到毛泽东回到餐桌，仍然没记起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要干什么。

“喏，快打水去吧。”李银桥递给我暖瓶。这时我才记起自己要干什么，为什么来到餐车。

打上开水后，我磨菇片刻，没有马上再经过餐车。我极想再见见毛泽东，再同他握手聊几句，却又莫名地踌躇。也许是怕影响他吃饭？也许是怕自己又表现紧张拘束手足失措？……

那一年，我们出车频繁。全年在北京呆的日子，哩哩啦啦算起来顶多个把月。到了1955年，五大书记有了相对固定的专列，乘务人员也相对固定下来。一看哪个车长哪些列车员动，便知道哪位首长要外出。

我被分配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同李凤荣一道在毛泽东的软包厢中值班。接触多了，情况渐渐熟悉，对毛泽东及其身边卫士的习性也有了较多了解。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们毕竟不曾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每天照顾毛泽东生活，形影不离的只是那群年轻小伙子，是那些男卫士。那年，李家骥、马武义等同志已经调离。又来了田云玉、封耀松等更年轻些的卫士。

我至今鲜明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长筒线袜上那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时所强烈产生的惊讶和感动。他坐在沙发上和卫士们聊天，漫不经心伸出两腿，裤腿管便有些抽缩。于是，长筒线袜露出来，脚腕处一块针线很粗的大补丁，似乎和脚跟处一块补丁连起来了。我望着那双粗线袜出神，连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没听进。

晚上，封耀松给我送来一件睡衣：“小姚，辛苦辛苦，帮主席补一下。”

那是一件黄格睡衣，臂肘处磨得很薄，终于露出洞。

“可是，没有布呀。”我翻腾着抽屉和针线包。除了医用纱布，什么布头也没找到。

“那不是布吗？”封耀松指着纱布说。

“用纱布？窟窿眼多大呀，能漏个人了。”我开句玩

笑。

“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

“别逗了，这么大的国家，你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久了你就明白了。”

还能说什么？我使用纱布补了毛泽东那件睡衣。从我上专列直到1965年我离开，毛泽东始终穿的这件睡衣。

有次专列停在上海，晚上市委组织了舞会。出发前，田云玉换了条新裤子，精心压过裤线，挺挺抖抖很精神。毛泽东打量着，笑着说：“你们看哪，小田的裤子笔挺笔挺，能削铅笔了。”田云玉脸红了，有些难为情。此后，他再不曾精心压裤线，穿戴很随便。也许受了这些事的影响，我在穿戴上也不讲究，很随便。十几年中，一直穿一身铁路制服，布的。有时皱皱巴巴也没想过熨平。从没穿过裙子，也不曾注意打扮。

毛泽东显然是过惯了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随遇而安，已成习惯，不好再改变。他的高级软包厢里，睡床本来有弹簧软垫，但他命令撤掉，就睡硬板床。枕头也是硬邦邦，夏天热时，随手垫张报纸当枕，随便得很。

但是，毛泽东的随便中也包含着严谨。他总是长衣长